

# 敦煌的借贷： 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

〔法〕童丕 著 余欣 陈建伟 译



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

中华书局

· 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 ·

# 敦煌的借贷： 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

[法]童丕 著

余欣 陈建伟 译

中 华 书 局

2003年2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 / (法) 童丕著；余欣，陈建伟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

(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

ISBN 7-101-03832-8

I . 敦… II . ①童…②余…③陈… III . ①经济史 - 研究 - 中国 - 中古②社会发展史 - 研究 - 中国 - 中古  
IV . F1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8079 号

责任编辑：柴剑虹

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

**敦煌的借贷：**

**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

[法]童丕 著

余欣 陈建伟 译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9<sup>3</sup> / 4，印张·204 千字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20.00 元

ISBN 7-101-03832-8/K·1594

## 译者前言

《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Le crédit à Dunhuang: vie matérielle et société en Chine médiévale*,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95)是法国学者童丕(Éric Trombert)先生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作。

法国的汉学研究根基深厚,巴黎素有“汉学之都”的美誉,最早的学院派汉学研究的传统就是法国汉学大师雷慕沙(Abel Rémusat)开创的。由于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的东方写本部(La Section Orientale du 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和集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等处收藏着丰富的敦煌西域文献与文物,法国学者得地利之便,可以随时接触写本原卷,所以近百年来,他们的敦煌学研究一直长盛不衰,名家辈出,佳作纷呈。其特点是既重视原始材料的解读,又强调借鉴社会科学的新方法。这一优秀传统已为当代法国敦煌学界的新一代学者所继承,童丕先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童丕早年于国立东方语言学院(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学习汉语和越南语。后入巴黎大学(索邦),研究欧洲中世纪史。1973—1974年,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留学。1977年,在巴黎第七大学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关于1920—1930年中国的典当业。随后进入法国国立科研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缩写为 CNRS),负责编写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教授捐赠给亚洲学会图书馆的图书目录。1981—1995年,作为苏远鸣(Michel Soyumié)先生领导的敦煌写本研究组的成员,参与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3—5卷(*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 - 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vol. 3, (n° 3001 - 3500), Paris, Fondation Singer - Polignac. 1983; vol. 4 (n° 3501 - 4000) et vol. 5 (n° 4001 - 6040),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 1991 et 1995.)的编撰。现任中国文明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 Civilisation chionise),即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缩写为EPHE)和国立科研中心联合组建的UMR 8583研究组主任,并兼任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四系和综合科技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Département Humanités et Sciences sociales à l' École polytechnique)研究导师。

童丕先生主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尤其是敦煌文书中的借贷契约和寺院账簿。近年来是童丕先生学术创作上的丰硕时期:1995年,《敦煌的借贷》作为“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论丛”(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Études Chinoises)之二十九出版。此后,在日本著名汉学家池田温先生和北京大学张广达教授帮助下,完成了伯希和在库车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Douldour - âqour)发掘的二百余件汉文文书和佛典断片的整理,新著《库车出土汉文文书》(*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 Éric Trombert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du Collège de France, 2000.),已于2000年7月由汉学研究所出版。他还陆续发表了《六至十世纪中亚的棉花沿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播的轨迹》(“Une trajectoire d'Ouest en Est sur la Route de la soie. La diffusion

du coton dans l'Asie Centrale sinisée (6<sup>e</sup> - 10<sup>e</sup> siècles)", *La Persia e l'Asia Centrale da Alessandro al X Secolo*, Roma: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1996, pp. 205 - 207)、《十二世纪中国的磨》("Un Moulin chinois du XIII<sup>e</sup> siècle", *Arts Asiatiques*, 51, Paris, 1996, pp. 81 - 95)、《饼状的红花——古代中国的一种染料植物》("Des fleurs rouges en gallette. Une plante tinctoriale dans la Chine ancienne: le carthame", *Journal Asiatique*, 285.2, Paris: Société Asiatique, 1997, pp. 509 - 547)、《酒与佛教——八至十世纪敦煌寺院的酒类消费》("Bière et bouddhisme: la consommation de boissons alcoolisées dans les monastères de Dunhuang aux VIII<sup>e</sup> - X<sup>e</sup>", *Cahiers d'Extrême - Asie*, Vol. 11: *Nouvelles études de Dunhuang*, Jean - Pierre Drège éd., Centenaire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 Kyōto: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 section de Kyōto, 2000. pp. 129 - 181)、《丝绸之路上的纺织业和织物——产地与交换的地理因素》("Textiles et tissus sur la Route de la soie. Éléments pour une géographie de la production et des échanges", *La Sérinde, terre d'échanges*, direction scientifique Monique Cohen, Jean - Pierre Drège, Jacques Giès,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00, pp. 107 - 120)等论文。

《敦煌的借贷》获得法国汉学界的较高评价,被认为是“不仅得以重现了这个时代的经济,而且展示了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戴仁语),是沿着谢和耐(Jacques Gernet)《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学者。

本书的具体内容和结论,读者取书自观,便可明了,所以译者不想多作评论。此处只想就翻译过程中所领略到的其研究范式上的创新之处,略加剖析,与读者分享,同时附带介绍一下他的相关研究成果。

我们不难发现,童丕先生论著的最大特色就是是经济史、社会史、农业史和敦煌吐鲁番研究的融合,只不过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敦煌的借贷》不仅深刻地分析了敦煌契约文书的书式及借贷机制,而且用大量的篇幅描述借贷契约所展示的敦煌社会,包括:粮食作物的种类;各类织物的质地与制造工艺;旅行与贸易;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等等,试图以敦煌为切入点,揭示整个中古时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文化某些重要层面。而在《从寺院的账簿看敦煌的二月八日节》一文(“La fête du 8<sup>e</sup> jour du 2<sup>e</sup> mois à Dunhuang d’après les comptes de monqstères”, *De Dunhuang au Japon. Études chinoises et bouddhiques offertes à Michel Soymié*, Jean - Pierre Drège, éd., Paris, Droz, 1996, pp.25 - 72. 余欣、陈建伟中译文,载《法国汉学》第五辑,中华书局,2000年,58 - 106页)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

我们知道,二次大战后,年鉴学派逐渐在法国史学界取得主流地位,倡导一种所谓“整体史”(histoire globale)的研究范式。《年鉴》杂志的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宣称:“历史研究不容划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之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le métier de l’historien*, par Marc Bloch, Paris :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74, p.50 ; 中译本《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39页。)费弗尔(Lucien Febvre)也强调:“没有经济史和社会史,只有作为整体的可概括指称的历史。从定义上讲,历史在整体上是社会性的。”(*Combats pour l’histoire*, par Lucien Febvre, Paris :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53. p.20)其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加以发扬光大,明确提出了“结构”(structure)和“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的概念,布罗代尔阐释道:“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集合,一种构架,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并且是非常缓慢地推动它。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许多世代的稳定的因素:它们迟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流动速度,其他一些结构则很快消失了。但所有的结构都既是支撑物又是障碍物。障碍物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试想一下打破特定的地理环境,突破特定的生理现实,打破特定的生产力限制,甚至突破这些或那些精神心理的局限的困难吧。心态环境同样也是长时段的桎梏。”(*Écrits sur l'histoire*, par Fernand Braudel, Paris: Flammarion, 1969, pp. 50—51)“长时段,即各种结构和结构群的稳定和很少变动的历史。”(*Écrits sur l'histoire*, p. 114)因而特定地理生态环境和特定经济活动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最为关注的方面。布罗代尔指出:“在土地的表面,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物质生活,这种生活是由陈规、传统和很久以来的各种成功所组成的。举例来说,农业生产在18世纪以前整个世界都是占着最重要的位置……因此,物质生活这一表达所指的是人们的选择:不断重复的举止;客观实在的过程;古老的经验以及从时间的漫漫长夜流传下来的各种方法。”(*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67. p. 10;该书即三卷本的*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sup>e</sup> - XVIII<sup>e</sup> siècle*,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79 第一卷的初版本,改写后的版本无此节)相信我们在阅读完他的这部大著后,对以上这些抽象的理论将会有较为真切的理解。

比较史学方法的运用,是本书的又一特色。由于童丕先生具有早年研治欧洲中世纪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背景,因此书中常取欧洲相近时段和民国时期的史实与敦煌文书的记载进行综合分



析，信手拈来，新意迭出，此点为仅受过中国古代史训练的学者所不能及。但是作者非常谨慎，只是点到为止，从而避免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这是我们做中外历史比较研究时，应当借鉴的。

除了研究范式之外，附录中的十八份表格，共计四十余页，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恐怕是技术处理上最令人瞩目的地方。尽管有计算机的帮助，制作这些表格也是相当费力的劳作。对此，我们应向作者表示敬意。

重视新材料的挖掘，也是本书值得称道之处。陈寅恪先生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36页）新史料的重要性，早已为学界所共知。诚如荣新江教授所言：“敦煌学之所以一直作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而长盛不衰，原因之一是敦煌文献材料在不断地公布，敦煌学者在不断地思考新的问题。”（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65页）除了敏锐的问题意识外，童丕先生在材料的搜集上也是不遗余力的。譬如，书中所征引并翻译成法文的 Dx. 1270、P. 4053 V° 3 f. 1 和 f. 2、. 1409、P. 4093 f. 1 V°、P. 2207 pièce 2、P. 4514. 3 A V°、P. 2564 V°、S. 4812、P. 3100 R° 3、S. 5832 等契约文书，池田温 and 山本达郎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文献》III《契约》（Ikeda On and Yamamoto Tatsurō, *Tun - 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al History, III, Contract, Tōkyō: TōyōBunko, 1987, 2vol.*）均未收录。目前搜罗较为宏富的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亦有遗漏。尤其是 P. 4514. 3 A V°，由于缩微胶卷漏拍，一直未为学人所知，故童丕先生特将其图版附于书后。因此，仅就所提供的新的学术信息而言，本书也是我国敦煌学界不可

忽视的。

必须指出的是,《敦煌的借贷》出版后,童丕先生又撰写了长文《十世纪敦煌的借贷人》(“Pêteurs et Emprunteurs de Dunhuang au X<sup>e</sup> siècle”, *T'oung Pao*, vol. 80, fasc. 4 - 5, Leiden: E. J. Brill, 1994, pp. 298 - 356; 耿昇中译文载《法国汉学》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60-128页),对该书作了重要的补充。在池田温先生《敦煌の便谷历》(载《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の诸问题》,中国书店,1987年,355—389页)和唐耕耦先生《敦煌写本便物历初探》(《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37—196页)的基础上,对敦煌的便物历作了新的研究,详细考察了便物历的结构和类型,债权人和借贷人的身份与社会地位,借贷物品的种类,借贷的条件:期限、利率、担保,生产性借贷等,认为不应过分渲染借贷的负面作用,而应正视信贷在经济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它有助于农业生产的正常运作,并有利于开发借贷物的商业价值。同时,他力图跳出经济史研究的藩篱,试图将便物历所反映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及其与社会等级升降之间的联系,妇女在家庭生产中不容忽视的作用,农业生产与食品制作诸问题,置于社会史的广阔视野中加以观照,揭示了便物历远远超越信贷范畴的研究旨趣。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当一并参考。

这里再简单地提一下童丕先生的新作《酒与佛教》。此文长达五十余页,是他在敦煌社会经济文书领域的又一贡献。作者研读了敦煌文书中大量的寺院账簿(入破历)后发现,尽管佛教传统是禁酒的,但令人惊奇的是,敦煌寺院文书表明,僧尼们用于买酒和酿酒的支出是非常大的,并且是所有僧尼阶层都普遍参与,以群体聚饮的形式在各种场合消费。一年之中,饮酒的机会是很多的:集体劳动后的简单的聚餐;传统节日,如冬至和除夕;大型佛教节日,

如二月八日节、盂兰盆节等。总之，各种有僧尼参加的非佛教节日都饮酒，只有一些特定的佛教仪式才不用酒。除了节庆支出外，酒还是一种支付手段。童丕还发现，尽管有很大一部分是寺院自己酿制的，但仍有一部分是由外界的酒店供应的。寺院是它们的主顾和酿酒所需粮食的提供者。至于造成这种异于中国其他地方的现象的原因，童丕认为，是由于敦煌寺院和世俗社会处于共生互利的状态，所以僧尼们接受了这些违背佛教准则的活动。文末还附了一篇关于 P. 2763 文书的短文，讨论了敦煌的酒的原料成分。

1999 年春，我到北京搜集资料时，从荣新江教授手中借阅并复印了此书，并在柴剑虹先生的热情鼓励下，开始着手翻译。由于自己法文水平有限，遂邀请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的陈建伟先生加盟。原先以为本书篇幅不过二百余页，相信一年半载便可大功告成。孰料竟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年之久。自接受此任务后，译者便与童丕先生经常书信往还，探讨学术问题。2000 年 6 月，首都师范大学“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暨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译者与他初次会面，蒙他见告正在积极致力于中国农业史研究，并准备把研究时段往下移。次年 6 月，他又来北京大学出席“唐宋佛教与社会：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得以再次欢聚，畅谈中国及海外敦煌学、汉学的现状与得失，并互赠论著。稍后，我有机会赴巴黎访学，期间我们就本书翻译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商谈。数年来的交往，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深深为童丕先生过人的学识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所折服，并为其对中国文化的挚爱所感动。早日完成翻译工作，让童丕先生的作品能为更多的中国学者参考利用，一直是我们的心愿。现在译稿即将付梓，感到非常欣慰。希望能借此机会，向促成本译著出版的柴剑虹先生和

---

业师荣新江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数年来,陈建伟先生和我互相取长补短,配合默契,亦堪称人生一大幸事。这段友情将永远值得我们珍惜。

余欣

2002年9月10日

写于无逸斋

## 序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有关 8 至 10 世纪的敦煌汉文借贷契约的最珍贵的研究成果之一,这部论著可使我们对这一处于中亚门户的绿洲的经济和日常生活有所了解。在本书中,童丕先生搜集了所有能找到的现已散藏于世界各地的资料,甚至将在吐鲁番地区、敦煌和西北其他地方发现的 7、8 世纪的资料作了比较。他对契约中包含的信息做了极好的处理。并作了极有意义的资料汇编,内容包括借贷性质、借贷原因、担保方式、借贷者及其债权人……而前人从未做过如此系统和完整的研究。

但童丕先生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他还以商榷和注解丰富了自己的研究,而这些注解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关于经济史的,关于社会的,还有关于债据法的。童丕先生提供的所有资料,和他关于敦煌的农业文化,小麦、大麦、大豆及其同类作物,燕麦,在敦煌少量种植的水稻,播种和收获的日期,主要食物的不同价格,绢帛的不同种类,麻布、毡、棉布、织物的尺寸(对此官方有严格规定,与中世纪的西方国家在度量单位上的无序形成鲜明对比),两种织机的类型:垂直式的和层式的,织物的价格,远距离的旅途(吐鲁番距敦煌 700 公里,步行只需 28 天)……词汇,所有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注意,而对于将来的研究者,是极其有用的。

我们尤其要指出的是,童丕先生提及棉花的两种不同种类,一种是草本的,从西域引种,在中亚地区极为古老,至少从 1、2 世纪

的东汉起就很有名,另一种是乔木类的,宋时从南海传入;从8世纪起,后者在中国得到广泛种植。正如童丕先生所言,古老的丝绸之路,也可以说是棉花之路。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某些结论涉及吐鲁番和敦煌地区的经济史。在安史之乱(755—763)前,与京城联系还正常的时候,中国的铜钱还在吐鲁番流通。在8世纪中期以后,甚至在9世纪后半叶的敦煌,充当支付手段的是谷物,这也是吐蕃占据敦煌后统治的衰退时期;最后是织物,这是在10世纪的曹氏统治贸易复苏时期。我们惊奇地发现在吐鲁番契约文书中提到了银钱,这极有可能传自波斯,在中国,除了汉武帝时曾进行过没有结果的尝试外,银子并不被铸成钱币。

有一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事实,就是在吐蕃人统治结束后发生的借贷契约种类的剧烈变化:旅行所需的织物借贷取代了农民的谷物借贷(在寺院的账簿上,920年开始被便物历所代替)。

但童丕先生著作中指出的社会事实的价值并不比所列举的经济资料低。敦煌好似一个典型的被无所不在的佛教所统治的社会。也许是写卷本身给了我们这个印象。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管这种佛教和最富有的寺院的支配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现象,都并不重要。正如童丕先生所指出的,当农民或半僧半农的人缺少小麦或大麦而需借贷时,他们经常是向作为管理机构的都僧统司或向寺院(理论上说,其寺院财产或不动产是不可剥夺的)借贷的。如果我们不考虑那些无息借贷(寺院只同意借给其附属的寺户),那么有关偿还的各种条款对于贫弱的债务人来说是很严酷的。这些条款既包括实物担保(损害赔偿,有时以个人诺言的形式出现而并无多大经济价值的质押,家资抵押,事先支付利息,土地不动产

质),也包括人身担保(取代债务人的保人,互保的一群人,亲属承诺以工付息,当然还有孩子将作为仆人)。所有这些借贷契约的法律特点和我们得知的敦煌农民被奴役的方式(在敦煌,利率由法律规定),当然也可以扩展到中国其他各省的偏远地区。这是该优秀研究成果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谢和耐

## 导 言

20 世纪初,敦煌莫高窟 17 窟,向历史学家们献出了大批资料,这些资料可能是在西夏入侵(1036)前几年被封存而与世隔绝,距今已有近千年之久。

其重要性无疑在于其资料数量的可观,仅汉文文书就有数千卷、叶和大量残片。但正是这些文献的原始状态才使其具有全新而独特的价值。其实主要是写本:文学和宗教作品的手抄本,尤其是佛教的,但也有往来书信、账簿、土地登记名籍、牒状、契约等等。直到本世纪初,历史研究几乎只借助于印刷的文献,其最古老的可追溯到宋朝(11 世纪)。这些刻本资料的记载不免存在着一些阙误,尤其是对于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而言更是如此。敦煌写本终于使这些领域的研究者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历史学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北魏、唐代实行的“均田制”中的土地制度问题。在这些写本发现以前,由于有法律条文和历朝正史的记载,所以其理论原则人所共知。但其实施与否还是个谜,人们不知道它是否从未真正施行过。敦煌发现的大量籍账是按区域登记的,从而使我们得以确认其真实性,确知在哪段时期施行并了解其实际方式。

长篇大论地讨论写本为我们所提供的有关中国 9、10 世纪的知识是无益的,任何人都能体会到它的重要性。更有必要的是,评估其局限并确定其中难点、陷阱所在,因为这些领域的研究开拓得



还不够。

人们普遍认为，存放于 17 窟的写本属于一个或几个寺院的档案室。这种特别的和有限的资料来源永远也不应被忘记，尤其是当人们研究世俗社会和经济时。在这些问题上，敦煌宝藏如同一面扭曲的镜子。事实上，应当意识到与之相关的写本只是偶然地保存在那儿的，应当意识到肯定还存在别的更多的，或许更明确的写本。而这些写本是档案保管员认为没必要保管的，更不用说有些写本根本没有落到保管员手中而只是在民间流传。如我们所掌握的借贷契约，它是本书的研究对象，我们看到本书将利用的两份最重要的资料（S. 1475 写本和咸 59 写本），是因与我们的课题毫不相关的原因出现的：他们抄在一部佛经论释的反面，这卷写本是一位著名的注疏家法成和尚撰写的。9 世纪初他正住在敦煌。这两个卷子被僧人们保存，无疑是因为正面的佛经。令 20 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感到庆幸的是，由于手抄经卷的敦煌纸张稀缺，人们从不扔掉已用过的纸张，而是重新利用其背面，然后还用来打草稿，直至没有空白之处为止。这才使我们拥有了大量有物质生活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大量文献和各种题记。这种节约纸张的代价是许多文献只是习字或草稿<sup>1</sup>，因而经常难以辨认。

扭曲的镜子的另一个结果是：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资料数量很少，而且大部分资料只与一个地方有关，即佛寺。我们上面提及的两件契约即与灵图寺的寺仓和都司仓的借贷有关。那些世俗百姓间签订的契约没有任何合适的理由在藏经洞中被发现。因此尽管人们在敦煌发现了这些契约，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些契约并不代表整体状况。从这一点上说，吐鲁番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知道，后者的组成部分是本世纪初西方考古探险队和 50 年代开始的中国组织的考古队发掘所得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来自阿斯